



清史译丛

QING HISTORY
OVERSEAS RESEARCH

▲ 第六辑



清史译丛

QING HISTORY
OVERSEAS RESEARCH

▲ 第六辑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组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清史译丛. 第六辑 /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组.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ISBN 978-7-300-07801-4

I. 清…

II. 国…

III. 中国-古代史-研究-清代

IV. K249.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62311 号

清史译丛

第六辑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组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48mm×210mm 32 开本	版 次	2007 年 1 月第 1 版
印 张	9.375 插页 1	印 次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260 000	定 价	26.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出版委员会

(按姓氏笔画排序)

马大正 于 沛 朱诚如 成崇德 李文海
陈 桦 邹爱莲 孟 超 徐兆仁 戴 逸

《清史译丛》编委会

主 编：于 沛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美] 孔飞力 王大庆 王 江

王晓秋 [法] 巴斯蒂夫人

[德] 达素彬 [俄] 米亚斯尼科夫

朱政惠 张西平 [英] 吴芳思

杨念群 赵世瑜 耿 昇 徐 浩

徐思彦 钱乘旦 虞和平 戴 寅

执行编辑：徐思彦 王大庆 戴 寅 叶柏川

康 越 唐 博



在编纂清史时，“要有世界眼光，要把清史放到世界历史的范畴中去分析、研究和评价。既要着眼中国历史的发展，又要联系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这是搞好清史编纂工作的重要原则之一。既要有高度的民族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继承和弘扬中国史学的优秀传统，又要有“世界性的眼光”，这是完成新世纪我国这项重大文化工程的切实保证。

马克思说：“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大抵从15世纪、16世纪开始，直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形成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正是在世界历史发展的这个重要的转折时期，清王朝在面对西方列强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开始融入世界。研究纂修清史的基本原则和内容时，应高度重视清王朝社会发展的世界历史背景。纂修清史要进行必要的理论准备，如何认识和体现出“世界眼光”，即是重要的理论准备之一，为

此，我们需要加紧这方面的研究。

纂修清史，既是面向全体中国人的，也是面向全世界各国、各民族的。在诸多文化体系中，只有中华文化连绵数千年，持续发展没有中断。这个事实本身就表明中华文化具有伟大的生命力、强大的吸引力和凝聚力。然而，这一切并不是自发地实现的，因为文化需要人来传承。今天我们纂修清史，正是在继承、发展和弘扬五千年悠久的中华文化。但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华传统文化面临着继往开来、重铸辉煌的挑战。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与世界文化进行有效的对话、交流，这是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通过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交流、碰撞，中华民族文化将成为世界文化中具有独特魅力的部分。我们今天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纂修清史，应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现实，积极探寻不同文化的“交汇点”，在纂修清史的过程中不仅能做到光大中华文化，而且能促进全球文明。

清史研究的中心在中国，优秀的清史专著，应该出自中国历史学家之手，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这也不排斥了解和有选择地汲取外国学者研究中的积极成果，及时地介绍和评析海外清史研究的学术思潮、前沿问题、热点问题和重要成果，加强海内外清史研究学者的交流。

正是基于上述基本认识，经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批准，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组决定编辑出版《清史译丛》。该译丛将视具体情况，通过“专题研究”、“论著及文献选译”、“学术综述”、“名家访谈”、“海外专稿”、“理论争鸣”、“新书书评”等栏目，及时地将海外清史研究的最新动态介绍到国内来。《清史译丛》是广大清史研究者、爱好者共同的园地，让我们共同用辛勤的汗水浇灌她，使其在清史纂修工程中能够做出更大的贡献。

2004年1月

论著及文献选译

《以他们自己的方式：科学在中国，1550—1900》前言	1
[美] 本杰明·艾尔曼著，原祖杰译/1	目
女性之手：中华帝国晚期及民国初期在妇女生活中	
作为学问的刺绣 [加] 方秀洁著，孙 静译/25	
鬼寻找替身：女性自杀及其重复行为	录
[美] 韩瑞亚著，孙 青译/66	
从来访者到入侵者	
——德国旅行者与中国的相互作用（1692—1872）	
[德] 拉尔夫·埃明著，孙立新译/108	
戈洛夫金特使出使中国的谈判方略	涂昌翰译/120
英国议会文件有关瓜分狂潮时期列强争夺	
中国铁路权益资料选译 吴乃华摘译/140	

学术综述

有关清末民初俄中关系的俄文档案文献资料简介	
[俄] E. A. 别洛夫著，陈春华译/199	

图书评介

清代满洲认同的几个问题

——以《孤军》为讨论中心

[中国台湾] 李典蓉/231

中国文化带给欧洲的困惑

——《耶稣会士傅圣泽神甫传（1665—1741）：

索隐派思想在中国及欧洲》译后感

吴莉苇/254

明治政府大陆政策的历史展开

——评安冈昭男《明治前期日中关系史研究》

胡连成/259

黄东兰著《近代中国的地方自治与明治日本》

王 笛著，易茗译/273

阶段成果

晚清日本驻华领事报告简介

晚清日本驻华领事报告编译课题组/277

论点摘编

18 世纪以来中国财政变迁及相关问题

[美] 王国斌/286

论华人出国史研究

[美] 孔飞力著，龚咏梅译/288

19 世纪德语文献中的中国游记

王维江/290

Micharl Szonyi, *Practicing Kinship: Lineage*

and Descent in Late Imperial China

何淑宜/292

Peter C. Perdue, *China Marches West:*

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Eurasia

田 实/294



《以他们自己的方式：科学在中国， 1550—1900》前言^{*}

☐ [美] 本杰明·艾尔曼 著

☐ 原祖杰 译

1

论著及文献选译

体例说明

这部著作并不是要从历史的角度直截了当地对中国的科学逐项进行综述。值得庆幸的是，李约瑟的《中国的科学和文明》（《中国科学技术史》）为其提供了最好的资料。我所要做的主要集中在中国的自然研究，以及文人在 1550 年到 1900 年间对欧洲自然之学的掌握。我尤其要展现的是满族统治者和汉族学者是如何通过朝廷、文人与耶稣会士、新教徒之间的接触，拓宽了帝国后期的天文学、地理学、数学和医学研究，后者是将欧洲的自然

^{*} Benjamin A. Elman, *On Their Terms: Science in China, 1550 - 1900*.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哲学作为其宗教遗产的一部分来加以介绍的，所及之处也包括了物理、化学和科技等领域。

在本书中，文人一词指的是那些拥有土地的士绅中的一部分，他们通过对经学、宗族礼仪和文字出版知识的掌握而维持着文化精英的身份。士绅在这里指的是那些在1900年以前作为地主控制地方权力或作为政府官僚控制省区或全国权力的人。无论是一般意义上的士绅，还是其中的文人，其文化地位与他们在科举考试中的级别相互关联。此外，在帝国后期，由于商人也跻身士绅精英之列而出现绅商混杂的局面。

对中国历史人物并没有加注汉字。其中大部分可在《明人传记词典》(*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 DMB)、《清代名人》(*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 ECCP)，以及霍华德·布尔曼(Howard Boorman)和理查德·霍华德(Richard Howard)编写的5卷本的《中华民国人物词典》(*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 China*, 5 vol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7-1971)中找到。文中所引中文和日文资料以拉丁化了的参考书目的形式置于书末。

像“西方”这样的术语在第一到第三部分指的是早期近代的欧洲(1500—1800)；在第四、五部分则包括了美国和近代欧洲(1800—1900)。中文资料一般称之为“西方”或“西方的”。在第一至第七章，当焦点集中在欧洲，而不是整个西方，我也相应地将其收缩到西欧。通常情况下，我是将“西方”作为耶稣会士、新教徒和中国人在提到他们自己或“其他人”时而使用的文化建构来介绍的。“欧洲的”或“欧美的”将被用来指代更具有历史和年代精确性的区域化观点。

“道学”一词将表示形成于宋、元、明时期的文人思想流派。不幸的是，有一种将上自唐代(618—907)下迄清末(1911)的所有经学思想潮流皆归于“新儒学”的倾向。读者应该谨防这种将新儒学混为依附于它的宽泛杂乱的称谓的倾向。“道学”的定义和内容在11世纪、12世纪引起的争议如同它在17世纪、18世纪的争议一样多。“程朱理学”将特指被官方认可的诠释经典的

程颐（1033—1107）和朱熹（1130—1200）学派。这些诠释在1313年被官方应用于科举考试，直到1905年一直作为科举考试的基准。

史学问题

在1894年到1895年的中日战争中，日本陆海军决定性地击败了清王朝（1644—1911）的军队。自此以后，中、日两国的爱国者和学者都认为，在1894年之前，明治日本（1868—1911）在现代科学方面就已经大大超越了清代中国。事实上，战争之前，许多当时的观察家都认为，清朝的陆、海军要更强一些，起码在数量上是如此。1895年以后，双方各自重新撰写他们的历史，为胜利的日本提供证据，也为战败的清帝国哀叹不已。对于汉、满之民，这场中日战争改变了1865年到1895年清代自强改革的性质，这场改革被说成是科学技术的灾难。^①

中国历史上的海战

作为对1895年清朝不幸的一种讽刺，是中国自宋朝（960—1279）以来时常蓄养着一支力量可观的海军，其中包括蒙古人在1274年和1281年两次试图入侵日本的和1293年入侵爪哇的（海上力量）。其后，明朝（1368—1644）海军在1403年和1434年完成了几次著名的远航，进入东南亚和印度洋。15世纪60年代为准备一场在西北针对瓦刺的可能性战争而大大削弱了海军，使上述行动被迫停止。

一支装备了大炮和火器的海军曾在16世纪中叶保卫过中国，抵御了日本海盗的入侵；开始并无成效，但最终赢得了胜利。明朝还帮助朝鲜阻挡了丰臣秀吉在1592年和1598年两次对朝鲜的入侵，并因而使海军进一步壮大。明代的效忠派早期曾在福建沿

^① 参见伊藤衆一：《科学技术在近代中国的地位》，载《东洋学术研究》，5卷，5—6期，1967，65～77页；比较莫里斯·科洛斯拉：《科学与普法战争》（Maurice Crossland, “Science and the Franco-Prussian War”,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6 [1976]: 185—214）。

海的几次重大的海、陆战役中打败过清朝。海军的兴盛一直持续到17世纪80年代清朝海军统一台湾。此后，中国人仍然在发展新型航船，诸如1699年第一次建造的浙江巨船。中国商人曾用它在宁波和长崎之间的北方海域从事中日贸易。尽管有日本的闭关政策，这种贸易仍一直持续到18世纪。^①

19世纪60年代的清朝和今天的我们都可能断言，鸦片战争之后清朝海军进入了一个复兴阶段，就像回到15世纪早期、16世纪中叶和17世纪那些比较灿烂的日子。而事实上迎来的却是甲午海战之后对晚清海军的冷嘲热讽。反满爱国者将郑和的舰队作为昔日中国伟大和当时清朝懦弱的象征。况且中日甲午战后，日本在现代科技领域取得了优势。日本海军对太平洋水域的控制地位一直持续到1945年。^②

甲午之后，双方对自己的命运进行了不同的解读：胜利的日本追溯到明治早期（后来进一步溯之于兰学时期——却没到丰田秀吉的失败）；而失败的清朝则追溯到1865年以后自强运动的失败（后来又进一步归咎于整个经学和相关制度）。明朝军事力量、清初海军舰队与晚清海军之间的可能性衔接变得不可思议。^③

学者重新审视了16世纪开始的西方对亚洲的第一次影响，

① 见罗荣邦：《明初海军的衰落》（Lo June-pang, “The Decline of the Early Ming Navy”, *Orients Extremus*, 5, 2 [1958]: 147-168），比较《中国的科学与文明》（*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vol. 4, part 3, pp. 477-553）及《清代的中国人》（*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pp. 108-109）；王赓武：《中英自1800年以来的碰撞》（Wang Gungwu, *Anglo-Chinese Encounters since 180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13-42）；比较罗纳德·托比：《早期近代日本的国家与外交》（Ronald P. Toby, *State and Diplomacy in Early Modern Japan: Asia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okugawa Bakufu*.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② 关于19世纪的背景，见布鲁斯·艾尔曼：《现代中国战争，1795—1789》（Bruce Elleman, *Modern Chinese Warfare, 1795-1789*. London: Routledge, 2001, pp. 57-68）。

③ 《中国近代学制史料》576~589页叙述了战前清方观点。巴斯蒂的《福州船政局的技术引进（1866—1912）》（见《纪念邵循正学术论文集》，246~247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记述了法国人对福州船政局的肯定（Marianne Bastid）。

得出的结论是，与更为开放地吸收荷兰科学知识的日本不同，明代中国人——如同他们的清代后人一样，拒绝耶稣会士提供给他们科学知识新世界。譬如，最近修改出版的《中国传统资料》第2卷就持有这种观点。该书不加批评地描述道，对于“友善的传教士传递的西方科学”，“中国人普遍不感兴趣”^①。

任何诡辩都不能将清朝在1895年的溃败说成一场胜利，即使空洞的或道德的也算不上。过去关于中国在科学上的失败和王朝在现代战场上的折损的解释是具有教育意义的，但它们对那场暴力的渲染掩盖了一个在事实上具有破坏性的后果——自那以后，或者说从18世纪90年代以降，中国就被置于西方和明治日本的怜悯之下。不少欧美人、日本人和中国人仍然将科学、技术和军事失败与1895年之后的中国史联系在一起；在文化阐释的层面之下，掩藏着另外一个故事。它不会、也不应该取代西方和日本帝国主义以科学、技术和帝国建设为手段的高歌猛进。然而，这本书要讲的是一个更为沉静的故事，那就是中国人对自然界、医学、工艺和商业的持久兴趣，为他们在1600—1900年间与欧洲科学、技术和医学的互动搭起了平台。

不幸的是，仍然突出地存在于当今史学界的对1865年以后中国西化努力的不耐烦已经使我们先入为主地低估了传教士所做的科学翻译、清代军事企业的工业化和科学技术以及新式政府学校在现代科技成长中发挥的关键作用。我们在对待19世纪末出现的军工厂、制造厂和翻译学校时，不能单单将其看做清王朝乃至中华帝国终结的前奏，还应看到它们是新事物到来的先兆。中国在1895年的失败不是因为缺少科学或技术。晚清满、汉领袖们面临的是太平天国运动后留下的地方势力的抬头和政治上的分崩离析，而这又加重了腐败和战争中的指挥失当。帕米拉·科洛斯拉（Pamela Crossley）曾指出，当时的军事改革“无力整合出

^① 狄百瑞和理查德·鲁夫拉诺编：《中国传统史料》（William Theodore de Bary, and Richard Lufrano, eds., *Sources of Chinese Tradition*, 2nd edition, vol. 2,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pp. 63 - 66）。

一种能够使新机构之间互相支持而非彼此掣肘的综合性发展”^①。

前现代与现代科学

当欧洲人在探险时代到达中国时，他们文化中最为高雅的学问（scientia）并不包括自然科学。对托马斯·阿奎那来说，属于高雅之学的范畴是自然哲学而非自然科学。科学（science）是一个中世纪的法语词汇，其意为精确而系统的知识，拉丁化后变成scientia，在学者和早期近代的精英当中代表着亚里士多德道德与自然哲学中特殊的一支。^②

菲利普·米兰奇桑（Philip Melancthon，1497—1560）的《论灵魂》（*On the Soul, De Anima*，1553）一书，坚持学问（scientia）与观点（opinion）应区分开来。前者代表一定的知识；后者指的是可靠并被广泛接受的信念。被纳入学者统治的学问之道的是中世纪的科学七科：文法、逻辑、修辞、算术、音乐、几何和天文。与中国古代的六艺（礼、乐、射、御、书、数）相似，这七种人文艺术是罗马教育中为更专业化的哲学、医学和法学做准备的基础学科。^③

① 最后的论点见黄政：《福建船政局历史地位论略》，载《船史研究》，1987（3），57～64页；帕米拉·科洛斯里：《孤军：三代满人与清朝的终结》（Pamela Crossley, *Three Manchu Generations and the End of the Qing World*. Princeton, N. J.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② 比较西德尼·罗斯：《Scientist：一个词的故事》（Sydney Ross, “Scientist: The Story of a Word”, *Annals of Science*, 18, 2 [1962]: 65-71）。作者指出“scientist”一词，在19世纪中叶之前并未广泛应用于英语。有关科学一词在早期近代的谱系，另见《在线牛津英语辞典》（*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Online*）。

③ 尼古拉斯·加定：《近代现实主义的形成：克拉维斯与开普勒对怀疑派的反对》（Nicholas Jardine, “The Forging of Modern Realism: Clavius and Kepler Against the Sceptics”, *Studies in History and Philosophy in Science*, 10 [1979]: 147-148; in Amelung Lackner, and Kurtz, eds., *New Terms for New Ideas*); 皮特·迪厄：《耶稣会士的数学科学与17世纪初经验的重构》（Peter Dear, “Jesuit Mathematical Science and the Reconstitution of Experience in the Early Seventeenth Century”, *Studies in History and Philosophy in Science*, 18 [1987]: 141-146); 皮特·迪厄：《科学革命的数学方式》（Peter Dear, *The Mathematical Way in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包伊修斯用拉丁文译介亚里士多德的开拓性工作中世纪衍生出数学基础教育的四种学科：算学、几何、音乐与天文学。它们代表了通往智慧的四种途径，与逻辑的三个分支，即文法、方言和修辞学形成对应。经过托马斯·阿奎那在巴黎和其他地方对穆斯林经典学术成就和基督教神学的结合，亚里士多德之学在文艺复兴学者和文人当中的倾向性顺序变为：（1）逻辑；（2）数学；（3）自然科学；（4）道德哲学；（5）形而上学。这一体系被复制于西欧耶稣会学院的教学计划（Ratio Studiorum）中。通过他们的知识教育理论，耶稣会士传播了亚里士多德的宇宙论、物理学和气象学。^①

像同时代的欧洲人和伊斯兰学者一样，帝制晚期的中国人在其前近代的精密科学中也首重数学，这些都不同形式地反映在中国的天文学、地理学、制图学和炼金术中。文人也用自然主义的阴、阳概念和五行循环说来解释“气”的千变万化。理性、抽象地解释自然事物和自然现象，是前近代世界范围的科学研究的普遍特征，在中国具有文人传统的自然研究中尤为突出。^②

我将要讨论的是中华帝国对自然事物的通行理解和精密科学的普及。但读者的兴趣若是在非精英公众对自然现象的认知，可

① 参见詹姆斯·维什鲍：《中世纪思想中的科学分类》（James Weisheipl, “Classification of the Sciences in Medieval Thought”, *Medieval Studies*, 27 [1965]: 54-55, 58-68, 81-90）；戴维·林伯格主编：《中世纪的科学》（David Lindberg, *Sciences in the Middle Ag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8, pp. 52-90）；戴维·金：《伊斯兰天文历法》（David King, *Islamic Mathematical Astronomy*. London: Variorum Reprint, 1986）。在19世纪晚期之前，无论是耶稣会还是新教徒，都未将逻辑学作为一个正规领域加以介绍。参见周秦·科茨：《接受逻辑学：一个西方概念在中国的采纳》（Joachim Kurtz, “Coming to Terms with Logic: The Naturalization of an Occidental Notion in China”, in Iwo Amelung, and Joachim Kurtz, eds., *New Terms for New Ideas: Western Knowledge & Lexical Chang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Leiden: E. J. Brill, 2001, pp. 147-175）。

② 参见奈森·席文：《东亚的科学与技术·引言》（*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East Asia*. New York: Science History Publications, 1977, pp. xi-xxiv）；简·P·豪根迪基克（Jan P. Hogendijk）、A. I. 萨布拉《伊斯兰的科学事业·引言》（*The Enterprise of Sciences in Islam*.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2003, pp. vii-ix）。

参考奈森·席文即将出版的著作，该著作论及科学、医学和以神、鬼、灵为天人中介的大众文化之间的关系。在有关中国佛教和道教的著作中，若其作者着眼于民间宗教而非具有继承性僧侣制度的神秘宗教，也将有助于我们对医药史的理解。^①

如果说中国、欧洲和伊斯兰前近代的科学经常意味着对自然世界的理性和抽象的理解的话，18世纪、19世纪崛起的近代科学则将精确科学与医疗推动下的技术进步结合在一起，后者已经超越了早期近代的技艺传统。此外，现代科学家强调的是数学命题在自然中的应用、实证方法、空间的几何化以及用现实的机械模式去解释西方的科学革命。科学哲学家经常用它们来说明为什么中国或伊斯兰世界没能产生激励现代科学的心理组合，我的讨论却对它们未加理睬。^②

我要探讨的是，中国人在其言辞和实践中，以他们自己的方式所表现得对自然研究的兴趣，而不是纠缠于为什么中国人没有完成欧洲人的创举。我会在适当的时候，通过比较前近代精密科学在中国的持久生命力和18世纪法国和英国向牛顿机械学和工业革命的决定性转变，为中国的自然研究做一些背景性铺垫。我也将比较欧洲在19世纪的迅速工业化和稍嫌迟缓却同样不同寻常的近代中国机器工业的崛起。

翻译还是背离 (Traduttore, Traditore):

基督教、科学与在华翻译

我在开始就应该指出对中华帝国晚期的耶稣会士和科学的研究

① 参见奈森·席文：《传统中国的病与医》(Ailment and Cure in Traditional China)，未发表作品；利维亚·科恩：《道教手册》(Livia Kohn, *Daoism Handbook*, Leiden; E. J. Brill, 2000)。

② 参见李约瑟：《大滴定：东方与西方的科学与社会》(Joseph Needham, *The Grand Titration: Science and Society in East and West*, London: Allen & Unwin, 1969, pp. 14-54)；托比·E·胡夫：《早期近代科学的兴起：伊斯兰、中国与西方》(Toby E. Huff, *The Rise of Early Modern Science: Islam, China, and the Wes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见我对该书1993年版的书评，载《美国社会学报》(*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November 1994: 817-819)。

究的不是和新教与科学的研究的相对饱和问题。其结果是，直到最近，绝大多数研究低估了前者的宗教活动而高估了后者的宗教活动。对于早期有关耶稣会和科学在中国的研究，我将会增加另一层面的资料 and 解释。我还要强调的是新教与近代科学在中国的关系，对此，无论中国人还是基督徒都在甲午战败后予以贬抑。

1600 年以来，学者与教士对耶稣会士在中国的作用褒贬不一。我将从多个角度加以描述，但我在科学方面的焦点会突出他们在 17 世纪、18 世纪反哥白尼、反牛顿的立场。当然，耶稣会士不能被看做科学的宗教敌人。在他们不能公开摆脱教皇和耶稣会强加给他们的反哥白尼（1473—1543）、反伽利略（1564—1642）立场时，他们中许多是“壁橱”哥白尼主义或牛顿主义者。其后果，如奈森·席文所述，“欧洲人的宇宙观因其令人失望地缺乏内部一致性而备受质疑”。耶稣会士在 17 世纪介绍哥白尼时先是将其说成是托勒密（和地心说）的追随者，尔后又说是第谷·布拉赫（地心—日心说）的追随者。以至于当蒋友仁（Michel Benoist, 1715—1774）最终在 18 世纪中叶介绍哥白尼的日心说时，中国文人以其太缺乏一致性而未予重视。^①

同样，我对新教的讨论将突出他们对达尔文进化论，尤其是对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观念的反对。虽然没有像天主教那样有一个教皇之下的统一的教会，鸦片战争之后来到中国的教友派、长老会及其他新教徒，在反达尔文方面甚至比耶稣会反哥白尼更团结一致。几乎没有哪个在华的新教徒可称得上是“壁橱”式达尔文主义者，他们差不多全都相信基督教化的进化观。当然，新教徒也不是科学的不可调和的敌人，尽管他们将现代生物学在中国的译介推迟了 30 年。

在中国历史上将耶稣会与新教徒合二为一的是他们带到中国

① 奈森·席文对此有过一个简洁论证，参见席文：《哥白尼在中国》（“Copernicus in China”，*Science in Ancient China*，vol. 4，Great Yarmouth：Variorum，1995，pp. 63～122），尤其是 85～89 页有关“有争议的哥白尼主义者”以及 101～102 页关于文人对蒋友仁的反应。